

博士论丛

On Robinson's New History School

李勇 著

新史学派  
研究

鲁滨逊



安徽人民出版社

ZWKR

博士论丛

K097.12/3

李勇 著

# 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

On Robinson's New History School



赠  
阅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343476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文波 封面设计:宋文岚 责任校对:曹芝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李勇著.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12

ISBN7-212-02360-4

I. 鲁...

II. 李...

III. 史学流派—研究—美国

IV. K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989 号

**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

李 勇 著

---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省人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225 千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2360-4/K·535

定 价:22.00 元

印 数:00001-01500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 序

时贤研究美国热矣，研究美国史亦热，且成绩斐然，去年由杨生茂、刘绪贻两位先生主编的多卷本皇皇巨著《美国通史》荟萃国内治美国史之精英，精心打造，合力推出，是为显例。<sup>①</sup> 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相对滞后的美国史学史，近年也有显著进步。李勇同志的博士论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的问世，自是这种进步的一个标志，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进程中的标志。

说起鲁滨逊，正如李勇文中所言，他在 20 世纪初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一代宗师，影响了美国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史学家。20 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美国“新史学派”述评》<sup>②</sup>，说的就是鲁滨逊的新史学派。那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伊始，改革开放之风劲吹，拨乱反正之势盛行，思想解放，学术新生，反思历史，关注未来，在这样的时代氛围感悟下，于是就有了我的这篇重评文章，对五六十年代关于这一派的评断提出了质疑与诘问：难道对鲁滨逊的新史学派可以像过去那样，简单地用“反动学派”或“无耻谬论”一类的话就能够抹去这一派的影响吗？恐怕不能。20 年过去了，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在进步，中国的美国史学研究也在进步，国内学界关于鲁滨逊新史学派的文章时有所见。李勇的书，材料翔实，论证有力，是在新世纪开始时中国学人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一种新认识，它

---

① 《美国通史》(六卷本)，著者依序为李剑鸣、张友伦、丁则民、余志森、刘绪贻(两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世界历史》1984 年第 12 期上。

的问世,能不说是中国的美国史学尤其是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的一种进步的标志吗?

揆情度理,我们可以从鲁滨逊这一派的史学思想中发掘许多闪光的东西,给我们以启示。读李勇的书,在这方面自然会有许多体悟,我这里只想说一点,即鲁滨逊关于历史教育的识见。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第五章《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知识》中,专论历史教育,专论历史教育与现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很精彩,亦启人心智,引发了我的不少联想。

当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在蓬勃地“凯歌行进”,但历史与历史教育事业并未同步“凯歌行进”。我看到有一个不算最新的材料:2001年北京零点调查公司采取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北京、上海、武汉与深圳四座城市14—28岁的1065名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倘以满分100分计算,受采访者平均得分为27.69分,超过60分及格分数线的仅占1.5%。这一调查结果说明,目前我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贫乏与浅薄,不由令世人吃惊,更令我等历史教育工作者吃惊。调查结果还显示:25—28岁的青年对历史的了解的程度却低于17—24岁之间年龄段的青少年。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前一群体(25—28岁)离开学校不久,且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要高于后一群体,他们的历史知识为何反而要少于后者呢?据我个人分析,其原因不外是:或是我们学校的历史教育有问题,那种习惯用满堂灌式的教育方法传播历史知识,最容易让学生遗忘;或是说明我们的历史教育正在退步;或是教育方法不当或历史教育被忽视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不禁还要问:我们各级各类学校的历史教育究竟怎么啦?难道经济的繁荣进步要以历史教育的退步作牺牲,商品的丰盈要以历史教育的匮乏作补偿,克丽奥(Clio,历史女神)的当代形象竟会是这样。

“历史是民族的史诗。”记得这是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细勒

的名言。我不能在这里详谈历史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的先辈与时贤在这方面曾有过许多的重要言论。就我个人看来,历史教育应当成为提高一个民族素质的最基本的国民教育的内容,在我们为了实现强国富民宏伟目标的今天,历史不应该成为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须知,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它最终也将被历史所遗忘。记得 20 年前,我在前面所说的那篇文章中说过如下一段话:“历史教育不仅传授历史知识,达到开阔眼界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培养人们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学会透过现象,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这就可以使人们以高屋建瓴之势观察事物,以赤诚纯朴之心敦风化俗,以振聋发聩之情敏于思考,于人的智力的提高大有帮助。”如此说来,历史教育与我们的富民强国事业就不无联系了。在这里,我毫不掩饰拙见是得益于鲁滨逊所说的历史教育与现代人智力增进关系的理念,有感于他的历史教育与现代工业社会关系的思想。

在 20 世纪最初的年代里,鲁滨逊或许是深谙米细勒“历史是民族的史诗”这一道理的“美国先知”,他对历史教育的识见,他本人以及这一派学人在历史教育方面的具体实践(如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学法,后世受益甚多),都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呼吁重视历史教育,既然如此,世人有什么理由要淡化甚至冷淡鲁滨逊呢?

虽然几度变调,虽然是历尽坎坷,中国学界(特别在老一辈学人中)对鲁滨逊其人并不陌生,不过他扮演的角色有的时候出现在正剧,有的时候出现在闹剧乃至滑稽剧中,但都是很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李勇书中有充实的内容,此也是本书很鲜明的一个特色。察看 20 世纪鲁滨逊新史学派输入中国,颇令人感喟不已。我们这里要定格在何炳松身上。说起鲁滨逊,在老一辈学人那里,即刻就会想起何炳松。何炳松之于鲁滨逊,犹如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又犹如矛之于盾,弓之于箭,鱼儿之于水,须臾不

可分离。

何炳松于1916年自美学成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等校，他的教学生涯与学术生涯都是从译介鲁滨逊的《新史学》开始的。何氏译本《新史学》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成为“吾国史学界所译有关西洋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第一部著作，历史意义重大”<sup>①</sup>。以此开始，何炳松不遗余力地从事输入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工作，李勇书中对此着墨尤多。由此，我想起了史学史研究需要扩展视野，开拓领域的问题。

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往往只满足于某国或某一地区历史学自身的研究，研究历史学家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史学思想，这当然是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但我认为，仅限于这一点，那是不够的。史学史研究既要研究上述内容，也要研究某国或某一地区的史学，历史学家的著述及其史学思想，向外传播，为异域所接受的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等。如以鲁滨逊新史学派输入中国而言，它何时通过何人传入中国，它是通过何种途径输入的，输入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微弱的还是强烈的，等等，都应当属于中国史学史家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种“影响研究”是双向的，这就是说，它也应当关注中国史学输入外国，以及输入后在域外所发生的影响。这种史学上的相互冲突而又相互融通的“影响研究”，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的史学史家在这一领域将是大有作为的。有论者在谈到21世纪的中国史学应如何发展时说，首先应当是：“在新世纪要使我国的历史学具有崭新的面貌，就必须进一步融入国际史坛。既要对国际史坛的最新发展及时了解，又要让国际史坛及时了解我国史学，从而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并扩大我们的影响。我们应当努力跻身国际史学家的行列，尤其是一流史学家的行列，

<sup>①</sup> 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增订再版代序，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与他们加强联系、对话和合作。”<sup>①</sup>这里说的也是中外(西)史学之间交流(“联系、对话和合作”)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很有见地的。

李勇同志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就读于颇有中国史学底蕴的华东师范大学,学的是中国史学史,因而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史学史根底。后来到了我这里,学习西方史学史。这几年,他潜沉深思,发愤苦读,颇有心得,以前学过的中国史学史,又使他比一般不谙中国史学史的学生多一个“参照系”,因而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中国视角”,使他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能看得更深透一些。他选择鲁滨逊新史学派作博士学位论文题目,自然于他是十分合适的。研究鲁滨逊新史学派,就需要了解西方史学的源流,尤其是近代以来欧洲史学的情况,需要了解 19 世纪末以来发端于德国的新史学潮流,上溯下延,由鲁滨逊新史学派而引发对整个现代美国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这种关联欧美、影响中国史学的题目,也正可发挥李勇熟习中国史学史的长处。一个博士研究生,其学习能否成功,选择一个适合其个性的论文题目,看来是重要的。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在于李勇的努力,那种锲而不舍的努力,以及对学业完美始终不渝的追求,如他论文中所引用的鲁滨逊《新史学》,是自己重译的,并不盲从齐思和等人的那个名译本,由此可见一斑。我们期望李勇以本书出版为契机,更加努力,勤奋学习,笔耕不辍,为我国的史学史研究多作贡献。

现在我们仍回到鲁滨逊这一学派上来。对于鲁滨逊,美国学者并不看重他;而中国学者却看重他,这第一人当是何炳松,因为他是第一个译《新史学》以及把新史学派理念带进中国的人;那么,第二个呢?是张广智?不,是李勇,因为他是第一个以鲁滨逊史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人,排名当然在何炳松之后。不过,对鲁

<sup>①</sup> 《书写历史》(《史学前沿丛书》第一辑),陈启能的“卷首语”,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滨逊史学之“行与不行”（“看重或不看重”），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秤。因此，对李勇的这本书也应当作如是观。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是为序。

张广智

2003年9月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

---

# 目 录

序 .....	1
导 论 .....	1
<b>第一章 19 和 20 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与学术 .....</b>	<b>26</b>
一、社会变革与史学转向 .....	26
二、本土史学的传统 .....	34
三、欧洲学术的泽被 .....	39
<b>第二章 鲁滨逊新史学派(上) .....</b>	<b>52</b>
一、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一代宗师 .....	52
二、比尔德、贝克和巴恩斯：新史学派的三巨擘 .....	63
<b>第三章 鲁滨逊新史学派(下) .....</b>	<b>73</b>
一、肖特韦尔、海斯和桑代克 .....	73
二、学派内部的分歧 .....	80
<b>第四章 历史学的现实与科学性 .....</b>	<b>94</b>
一、鲁滨逊史学的现实关怀 .....	94
二、其他成员的史学价值观 .....	99
三、鲁滨逊学派对历史学科学性的认识 .....	105
<b>第五章 史料与历史真实 .....</b>	<b>111</b>
一、鲁滨逊与比尔德的观点 .....	111
二、贝克、巴恩斯和桑代克的思想 .....	118

<b>第六章 历史的进步与广泛性</b>	126
一、鲁滨逊的历史观：从服膺进化论到怀疑进步性	126
二、其他成员的历史观	130
三、鲁滨逊学派心中的历史学的对象和范围	136
<b>第七章 史学方法的多样性</b>	143
一、鲁滨逊的史学方法多样性的主张	143
二、其他人的多种解释体系	148
三、具体的历史学方法	156
<b>第八章 鲁滨逊新史学派对美国史学的影响</b>	161
一、战后新史学的本土渊源	161
二、与新左派史学的关联	169
三、后现代史学的先声	177
<b>第九章 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上）</b>	185
一、何炳松的贡献	185
二、胡适的绍述	196
三、陈衡哲的接踵	200
<b>第十章 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下）</b>	204
一、蒋廷黻的服膺	204
二、张荫麟的播化	211
三、《史地学报》的传播	215
<b>结语</b>	224
<b>参考文献</b>	230
<b>跋</b>	250

---

---

## 导 论

有些开了一代风气的学者，因其后人超越了他们，而在学术史上被淡化。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sup>①</sup>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在20世纪初，是美国新史学的一代宗师，影响了美国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史学家；但是后来的史学史，特别是美国的史学史，有淡化他的倾向。

美国的史学史家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除比尔德(Charles A. Beard)<sup>②</sup>、贝克(Carl Becker)<sup>③</sup>之外的这一学派的其他成员，特别是对鲁滨逊，似乎很冷淡。其原因大致可归纳如下：首先，鲁滨逊在理论上的建树颇多，但实际的研究较少。他曾有过宏大的计划，但由于在开办新式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面，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种计划没有付诸实践，因而没能产生一项经典性的研究成果。其次，鲁滨逊研究的重点是欧洲文化史，而不是美国历史，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在美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一般而言，每个民族都有文化本位主义，总是对本民族的或研究本民族的有所偏爱，美国人未能逃脱这一文化上的局限。欧洲对美国而言是外国，因而研究外国历史，就不如研究美国历史受学术界的重视。最后，鲁滨逊是典型的学者

---

<sup>①</sup> Robinson，旧译除饶平生外，还译为鲁滨荪、鲁滨生等，今有译为鲁宾孙或鲁滨孙，一般译为鲁滨逊或鲁宾逊。

<sup>②</sup> Beard，旧译有裴德、皮亚特、毕尔等，今译为比尔德。

<sup>③</sup> Becker，旧译有贝克儿，今译为贝克或贝克尔。

和教育者,虽然他也介入社会实际,但是比较而言,这在他的生命不是最重要的,他历史研究的着眼点,是社会史中的知识、思想等问题,并未触及美国社会的热点,不像研究美国革命、宪法等那样,容易引起美国社会大多数人的注意,这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度,要获得社会的认可无疑是犯了“大忌”。换句话说,狭窄的读者面,使鲁滨逊没有享有他应该享有的声望。本书要讨论的就是他的新史学派的史学贡献和影响,以重新认识其在美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般说来,“新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说法,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学新趋势,它展现了有别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在西方,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 J. 勒高夫曾说过:“新史学似乎基本上是法国的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事实。”<sup>①</sup>尽管这话带有傲慢的口气,然而他也承认,“新史学在法国以外也在发展,而且常常有引人注目的创新。”<sup>②</sup>在国内,陈启能认为:“新史学从 20 世纪上半叶诞生时起,为了冲破传统史学的垄断地位,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有意识地针锋相对地与传统史学相对抗。大致到战后 50 年代,新史学在西方史坛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 70 年代则达到鼎盛时期。”<sup>③</sup>罗凤礼提出:“新史学的产生与崛起是西方各国几乎同时出现的自发现象。……西方新史学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各种具有不同方法和理论倾向的史学新流派的总汇。”<sup>④</sup>张广智的概括更精辟,他说:“就其大势而言,20 世纪的西方史学是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sup>⑤</sup>

① J. 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 页。

② J. 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 页。

③ 陈启能:《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为〈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作的序》,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 页。

④ 罗凤礼:《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 页。

⑤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2 页。

狭义上的“新史学”，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叛以考证手法研究和叙述政治史的传统史学。对于这一新的史学趋势，巴勒克拉夫总结道：“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家对 1945 年以前占优势的那种历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动。”<sup>①</sup>20 世纪 70 年代末，劳伦·斯通在回顾与总结 20 世纪西方史学时指出，1930 年前后西方历史学的潮流开始变化，“在过去 40 年的动荡中脱颖而出的‘新历史学’的特征首先在于它用新的分析法而不是旧的叙事法组织材料”<sup>②</sup>。

不过，本书要讨论的“新史学”，既不是广义上的，也不是狭义上的，而是特指 20 世纪初在美国出现，并延续近半个世纪的挑战传统史学的新的史学潮流，而且重点是其中的一个派别，那就是在鲁滨逊史学思想影响下的由他及其同事和弟子所组成的“鲁滨逊新史学派”。

把以鲁滨逊为核心的有着共同基本特征的一个美国史学家群体冠之以“鲁滨逊新史学派”，这样做从事实上和学术史上说，都是能够成立的。

事实上，鲁滨逊影响下的同事和弟子有：比尔德、贝克、肖特韦尔 (James T. Shotwell)<sup>③</sup>、巴恩斯 (Harry Elmer Barnes)<sup>④</sup>、海斯 (Carlton J. H. Hayes)<sup>⑤</sup> 和桑代克 (Lynn Thorndike)<sup>⑥</sup> 等，他们有的坚持欧洲史的阵地，有的则投入到美国史园地来耕耘，形成了积极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 页。

② L. 斯通：《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杨豫译），《国外社会科学》1983 年第 9 期，第 8—14 页。

③ Shotwell，旧译为绍特韦尔，今译为绍特威尔、肖特威尔、勺特威尔，本书则译为肖特韦尔。

④ Barnes，旧译为班兹、邦斯、崩斯，今或译为巴纳斯、一般译为巴恩斯。

⑤ Hayes，旧译有汉斯、嘿斯、黑斯、海士，今一般译作海斯。

⑥ Thorndike，旧译为桑代克，今或译为桑代克，本书译为桑代克。

入世的、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文化史的风气，在美国产生了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具体内容下文将会给予较为充分的交代。

从学术史上看，“鲁滨逊新史学派”这一概念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史学史家厄恩斯特·布雷塞奇(Ernst Breisach)就本质含义上提出过，他说：“1912年，詹姆斯·哈维·鲁滨逊选择爱德华·艾格尔斯顿的‘新史学’一词，作为其宣言的标题，这样，‘新史学’就成为这个新的历史著作学派的名字。实际上，最确切地说，可以把这个学派视为美国现代历史编纂学的雏形。”<sup>①</sup>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引卡尔·拉塞尔·费希特(Carl Russell Fish)的话称之为“历史学的鲁滨逊——哥伦比亚学派”<sup>②</sup>。国内学者中，庄锡昌在论述美国史学时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指出，美国20世纪初的“史学派别总称为‘新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士·鲁宾逊”<sup>③</sup>；张广智则明确提出“鲁滨逊一派”<sup>④</sup>、“鲁滨逊的‘新史学派’”<sup>⑤</sup>、“鲁滨逊这一派”或“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派”<sup>⑥</sup>的概念。

据考证，在美国最早公开于刊物上使用“新史学”的是E. W.

①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4, p. 316.

②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88, reprinted 1992, p. 121.

③ 庄锡昌：《美国的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46—52页。该文又作为附录收入他的《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张广智：《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92—105页。

⑤ 张广智：《实用·多元·国际化——略论现代美国史学的特点》，《江汉论坛》1991年第6期，第61—66页。

⑥ 张广智：《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史学》，《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第138—145页。该文又收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校友会：《笃志集：复旦大学历史系七十五年论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422页。

道(Earle Wilbur Dow)<sup>①</sup>。1891年,兰普勒希特出版《德国史》,在德国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1898年4月《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发表了密执安大学E. W. 道的一篇书评,题目是《新史学的特征:评兰普勒希特的〈德国史〉》(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 Apropos of Lamprecht's "Deutsche Geschichte")。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概括道:“简言之,新史学是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作为社会存在加以考虑的;政治现象不是历史学对象的唯一,国家也不是统御万物的因素。新史学以为,人类生活中某种自然的、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因素是基本的,而这些因素的本质、转变和相互联系,构成了某个特定时代的文明。新史学——于是展现它的基本特征——坚持从理性进化的视角描写人类历史的法则。它间的问题不是‘它的真实是怎样的?’而是‘它的真实是如何发展而来的?’<sup>②</sup> 其目的在于,像艺术或科学那样从追踪事物的源头开始;它的研究在于,为每一个民族发现其典型的发展阶段,而这种阶段包含着形形色色人之间的连绵的生活趋势。它希望人们通过严格的归纳手段,至少能够探寻出人类的世界和民族的世界怎样成长为今天的样子,而去掌握可靠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结论。”<sup>③</sup>

到了1900年,艾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题为《新史学》的主席演讲。他认为政治史和军事史是历史学必须涉及的领域;但又批评了旧史学,认为它总是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为研究对象,未免过于陈旧了,并且过去的军事史研究,忽视

① 参阅 John Higham, *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11; Ignacio Olábarri, "New" New History: A Longue Durée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1, 1995, pp. 1—24.

② 这两句话的德文原为“Wie ist es eigentlich gewesen?”“Wie ist es eigentlich geworden?”

③ Earle Wilbur Dow, 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 Apropos of Lamprecht's "Deutsche Geschich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iii, No. 3, 1898, p. 448.

了作为历史主体之一部分的广大妇女,政治史的写作没有包含同样是历史主体的儿童,忽视了作为现实读者的孩子们。因此,他自豪地预言:“那些因为写了城镇和城市编年史而感到谦卑的史学家,在不远的将来会走运的。”最后,他呼吁:在 20 世纪的历史学中,“士兵不应再占据他一直占据的地位了,我不是说战鼓和小号要从历史学中消失”,而是“我们要拥有文化史,真正的男子和妇女的历史”<sup>①</sup>。

可见,20 世纪初在美国主张新史学者绝非个别人;不过,有的并未形成什么学派,例如上文提到的艾格尔斯顿,就没有一所大学作为依托,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学生,形成不了学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史学派也绝不仅仅指鲁滨逊一派,相反还有其他一些史学派别,例如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学派。特纳学派与鲁滨逊学派的共同特征是:对现实社会予以关怀,突破“科学史学”的历史学仅仅是政治军事史的局限,服膺历史进化论。这两派也有明显的不同:前者研究的重点是美国的西部历史,而后的研究既有美国史又有欧洲史;前者主要使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释美国的历史,后者则主张用多种方法解释历史。

同时,鲁滨逊学派的成员,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鲁滨逊及其嫡传弟子,诸如巴恩斯、肖特韦尔、海斯和桑代克等;第二类是其及门弟子,如贝克;第三类是受其影响但又很难说有师生关系的,如比尔德等。本书对这一学派成员的选定采用的就是这种标准。

在 19 与 20 世纪之交出现的美国新史学,是美国本土史学和欧洲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果。在新史学产生以前,美国史学就有重实用和写思想与经济史的传统。同时,整个 19 世纪一流的美国史

<sup>①</sup> Edward Eggleston, “The New History”,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1900, in two volumes, Vol. 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1, p. 47.